

引 子

2017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四。病中，学友文富君来看我，只得挣扎着下床来，陪他坐了坐，之后还蹒跚着到校门口吃了便餐。

文富跟在我身边学习，已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而今他早过而立之年，且已在市委机关里任职，不想反倒越渐谦恭且多礼，体贴入微尤让人感动，经他慰问，病情顿似缓解了许多。

我落拓半生且才识浅薄，原是个没有什么教师资质的人，却因天幸机缘巧合，拥有过文富等众多“高足”，情谊恰如陈年老酒，窖藏迄今益觉甘醇。想到曾与文富等有约，要写点回忆性的纪实文章并附上他们经我点评的代表作品挂在“群”里边，甚至最好能成书出版，让大家看着也多一些念叹。“此时不干更待何时”，于是趁病情缓解翻身下床，坐到案前呵开冻笔……

是为引。

一 夏先生和况二先生

我初为人师，迄今已四十年。那时我还在农村学着“修理地球”，于半饥半饱中挣扎的乡亲们却要我“搭救睁眼瞎子”，好歹总要让他们认得自己的名字并知道如何记工分。推脱不过，我只得在自己那两间破茅屋里办起了“夜学”。虽然几年间进进出出的人不少，但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却唯独一个况二。他比我小一岁，学写字像握锄头棒那样双手捉住铅笔使劲往下戳，常常是笔头戳断几根、纸张戳出窟窿还戳不出一个大字来。除了跟着我识几个字，其他的诸如下田上树、打鱼摸虾，他样样比我行，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互相学习。还记得有一次他翻保管室围墙把我被收缴的书又偷了出来。因此，我们两人“彼此彼此”，他叫我“夏先生”，我叫他“况二先生”。

到我终于要离开生产队时，况二端着家里做的一钵豆花来送我，我也拿出珍藏的江津老白干，和他一起就着豆花儿喝了好些酒。当然，我们都醉了。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是和况二共在一床，然而，我恐怕是嫌他脚臭，头歪到一边，离他老远；而他却把我长了冻疮的一双臭脚紧紧地拥抱在自己怀里，眼角还残留着风干的泪痕……

这个情节，我曾经在一篇小说里提到过，但它却是千真万确的。况二先生，我的第一个正式学生，跟着我学会了名字，还有“人、手、刀、口”几个字，然而他回赠给我的东西却更多，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都有。

二 身残志坚的大师姐林梅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学校做了几年杂事之后，开始在重庆师专校报从事编辑工作，并且从1990年起“大权独揽”，在党委宣传部长的直接领导下，具体负责校报的组稿、编辑和印刷出版等全方位的工作。在那之前，我守过资料室，也学着编过学报和《书法教与学》报，基本上没有和同学们打交道。可现在不同了，校报直接担负着育人的责任，况且其作者和读者都多半是学生，想不和他们打交道根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自己都还没有出师的文字学徒又当起了师傅，得抽出时间给人改稿和讲解写作知识，必要时还得带领

他们到现场采访和写稿。最先跟在我身后跑的是两个小女生，一个是数学系1988级的林梅，另一个是外语系1988级的周黎娜。

在我的印象里，那时的林梅是个忧郁的女孩，沉默寡言且多愁善感，但细心如发并颇知感恩：感谢国家的残疾人政策好，感谢重庆师专能破格录取她，感谢老师和同学对她的关爱，还说最应该感谢的是辅导员刘灿国老师：在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的同时还注意到了她在写作上的一点专长，于是介绍她进了校报编辑部这个第二课堂。因此，她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聚精会神地听讲观摩，专心致志地写稿改稿，即便是拆个邮件装个信封这样的琐屑事情，她也是一丝不苟。

“好了吧林梅，剩下的事情让周黎娜来处理。”

“没关系老师，黎娜还在做别的事儿呢——”

一事刚完，她便站起身，用没拄拐杖的那只手去拿扫帚。而这时周黎娜便会跑过去，把她先扶回椅子上，再抢夺她手中还握着的扫帚：

“看你好强的，把活路抢完了我做啥子呢，哈哈。”

是的，周黎娜十分活泼且爱笑，两个人若都在编辑部，那气氛便真是说不出的舒适与美好。

1990年暑假，家住重庆主城区的周黎娜深入江津四面山山区做社会调查，在采访一位扎根山村的女教师后，写了一篇题为《绿化沙漠的人——记一位无怨无悔的山村女教师》的通讯，在赞颂山村教师为绿化文化沙漠默默奉献的同时，又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山村教育的窘迫状况。而林梅撰写的调查报告《来自残疾人世界的报告》更是旗帜鲜明，其主要内容包括三段经典的人物和事件描写，第一段是走访幽默风趣的聋哑技术员杨照强的笔记，第二段写了身残志坚的主治医生黄维乾，第三段则现身说法地向大家介绍了她自己的家庭。十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了她全家六口人的健康，十二根拐杖取代了六双健步如飞的腿脚。但是，飞来的横祸并没有把这个家庭摧毁，他们擦干眼泪，齐心协力与残疾和偏见抗争，无数个煤油灯下的苦读和无数次晨露中的苦练，父亲不但找回了自己强健的体魄，还成为了一名律师，四个子女中有三人相继跨入了大学校门，母亲和留在家中的儿子共同经商……林梅是用自身的经历向世人诉说，“残疾是人类的悲剧和缺陷，但绝不是人类进步的阻碍，因为残疾人总是在以千倍的毅力和勇气弥补和超越他们身体上的缺陷，用激情演奏着‘奋进’这样一首永恒的歌……”

1991年林梅大学毕业，正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护法》颁布，她被分配到了重庆市永川县（即现在的重庆市永川区）残联工作，兢兢业业地一干就是二十几年。2013年世界残疾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等权威媒体都纷纷报道了她的动人事迹,《人民日报》赞她“为残疾人撑起一片晴空”;《光明日报》说她“用残疾身躯温暖残疾人的心”。并且,她的家庭生活也十分美满,丈夫左国全二十多年来坚持每天接送她上下班,女儿左雨婷留学归来后在父母的母校重庆文理学院工作——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且将林梅当年撰写的散文摘录一篇于后。

大约在冬季

林 梅

在风雨潇潇的冬季,送她已有两年多。每当想起她,我心中便会涌起一股难言的酸楚和甜蜜……

她是我初中和高一时的化学老师。那时她已二十五、六,可看起来实在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她秀气、小巧,一言一行都流露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她是我们女生羡慕崇拜的偶像,那时我常把她当做我成人后的模特儿。我渴求有她的飘逸,有她的学识,有她的长发和白色连衣裙。

不知什么时候,她成了我知心的朋友;而我竟然也走进了她的内心世界。

我想,大概是那个雨天。我摔在稀泥成浆的路上,她悄悄扶起我,掏出洁白幽香的手绢,擦去我脸上的污泥,然后默默地扶着我往前走。我的手和心一起颤抖了,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她的善良和美好。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我那一跤是摔对了,若不是那一跤,也许我永远不可能得到她这个良师益友。虽说我

们有同样的性格、同样的追求，可是没有碰撞的机会，再相通的心灵也不会产生共鸣。我一直很自卑，一是因为有张不怎么好看的脸，二是因为有双不健全脚。尽管当时我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令诸多男生也望洋兴叹，可我却缩头缩脑犹如一只呆小鸭。为了帮助我摆脱自卑，她常常带着我出入公众场合，故意让我在隆重的聚会上抛头露面。每当我为自己的双脚感到难为情时，她便对我说：“别人拥有的，你同样也能拥有，甚至还会比别人拥有的更多更好。”在她的鼓励下，我克服了心理的弱点，惊喜地发现了自身的价值。与她亲密的交往，最初只让我感到得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的不断成熟，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友谊已经历一个又一个难关。每每想起，这句铮铮话语总会给我一种崭新奇异的力量。

感情是相互给予的，理解也是相互给予的。她能使我从困境中解脱，而她也能使我从迷惑中醒悟。她的爱人——陈老师是我们高三时的化学老师。我说过她人是漂亮的，而大凡漂亮的人都爱发脾气。一次学校举行篮球比赛，陈老师当裁判。比赛刚进行到下半场，她突然到操场叫陈老师回家打水，陈老师没动，她便吵开了。这件事我没亲眼看见，事后听到许多同学都在议论，我便对她说：“同学们平时都很佩服你，可大家认为今天这件事你有点不对……”她红了脸。尽管她在家里偶尔发脾气，可她在课堂上却始终面带笑容。一次她母亲

病得很严重，在教室外，向我提起时还险些掉了眼泪，我真有些担心她上不好那堂课。可一踏进教室，她依然轻松自如，谈笑风生。有时候，我问她怎么能有这样大的自制力，她反而有些不解地问我：“你们有什么过错？学生没有看老师脸色的义务。”我沉默了，想起了那些受了点气便对学生发泄的老师和因奖金少了便罢课的老师，如果他们也能这样该有多好！

十年寒窗，她是唯一走进我内心深处的老师，又是第一个让我和她分别时流泪的良师益友，两年多了，那滴亮晶晶的泪珠儿还挂在我记忆的闸门上。

她早已嵌入了我的生命之中。高二时，我和班上的一位男生遭到了流言蜚语的袭击。无辜的我不堪忍受谣言的攻击，倔强的我又不愿向谣言示弱。为此，我被班主任在班上不点名地大骂了一通，我委屈、愤慨甚至仇恨，我不明白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民教师为什么说话如此不负责任。在我情绪极端低落的时候，她找到了我，一反平常温柔的模样严肃地对我说：“你怎么这样没有勇气？人们的议论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把握好自己！”正是这句话，让我勇敢地度过了一个学期。

“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再回来。”分别时她突然一字一顿地说，脸上闪着圣洁的笑容。我羞红了脸，可又庄严地点了点头。我想，那样的时刻大约也是在冬季。因为冬季多雨，而雨又多情。

这篇文章，忆林梅和她中学老师的深情厚谊，发表于原《重庆师专报》1990年11月15日第4版，至今读来仍颇有情致。



而今幸福的林梅一家三口

再说当时，林梅和周黎娜都很勤奋，但稍嫌美中不足的是，她们更擅长写作的是诗歌和散文。在办报实践中我开始意识到：在学生中培养写作人才得有针对性，校报需要好的副刊作者，但更需要能干的新闻记者。基于这种认识，中文系1989级的学生聂荣进入了我的视野。

三 我和“大师兄”聂荣的故事

那时候的聂荣，体型和现在大不一样，脸是长条形，身材也瘦瘦的，远不似现在魁伟健壮。他在校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大块头”：几近两千字的《浅析〈河殇〉所推崇的文明》。因为那时候，全国批判《河殇》，校报也按上级要求设置了“大学生话《河殇》”专栏，聂荣的这一篇，是该栏目开栏的第三篇，发表在《重庆师专报》1990年4月25日第2版的头条位置。那之后不久，具体说是两个月之后的1990年6月25日，中国共产党建党69周年纪念日的前几天，他又在校报第2版发表了洋洋两千多字的《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发表“话《河殇》”那篇文章的时候，他还是“中文系1989级1班聂荣”，发表这一篇“跟着党走”，他的署名已经更改为“校团委宣传部聂荣”了。作为一个大一新生，他靠着两篇文章快速打入校团委宣传部并很快成长为部长，这自然引起了我的关注。但实事求是地讲，喜爱写作并且急于进取的聂荣，还没有等我去找他，他就已经大大方方地走到我面前来了。这一次，他依旧先在方格稿纸

上署好名并且规定了发表方式：“本报评论员聂荣”。

我看了看稿，只得告诉他，这恐怕不行，首先这署名就有些不妥，因为报纸发表评论员文章是有规定的，“再说本报也还没有聘请你当评论员……”

“哦——”或许根本没想到还会碰钉子，他的脸红了，但随即就和我争辩起来，大意为此前没聘现在可以聘——不是提倡毛遂自荐么，自荐在我聘不聘由你！

哟，这家伙个性好强！我只得耐下性子来给他讲了番道理，并且告诉他，他已经是校报的通讯员了，再努一下力还可以当记者——总之一句话面包会有有的，说不定哪一天你真能做评论员。

然而实事求是地讲，聂荣倒真是个能干的记者，人勤奋笔头也快，常常是当夜发生的事情当夜就成稿，并且基本上是每稿必中——稍事修改就能发表。但即便这样，聂荣仍有红脸的时候，那是因为囊中羞涩，“羞涩”到甚至连当天的午饭都成问题了。

“夏老师，赊几块稿费钱给我买饭票嘛！”

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却偏偏比一些家境富裕的同学更乐善好施，遇到“捐献”一类活动时竟生怕落后，手头如果没钱便连饭票也捐了。知道这些，对于他的上述要求，我便从未让他再碰过钉子。

1991年暑假，聂荣没有回家，留在学校跟我一起编印学校“纪念建党七十周年”论文集和“党在我心中”征文集两本内部资料性质的小册子。在当时这是大功一件，开学后学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作了表扬。他也因此产生了一点骄傲情绪，又由于他平时喜欢独自去驻守田径场上堆放体育器材的小屋（被同学们叫为土地庙），不大喜欢参与系里的事情——也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了批评，幸亏我及时予以提醒，并在系里为他极力“斡旋”，才终未造成大的影响。

说句笑话，如果说“善有善报”的话，1992年我坚持让聂荣留校工作得到的回报，就是当年便得以抽身脱产到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习了三个月——那是在岗工作几十年中，脱产学习时间最长久的一次。在那三个月时间里，聂荣顶起了编辑部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可是由于板凳没坐热，干了事还要遭老同事挤兑，有委屈也只能写信说说——至今想起来还怪难为他的！

留校工作后，聂荣在把校报版面编辑得颇有特色的同时，还写了不少好稿，他最擅长的是述评性新闻和杂文两类文体，杂文《敢于俭朴》《有感于靳羽西反对接风宴》《蝙蝠衫·一步裙》等，曾让学校不少青年教师为之倾倒。1995年6月初写的时评《考试作假要严打》，被我用作为本报评论员文章发表在6月10日的校报头版上，荣获了重庆市高校好新闻一等奖和重庆新闻奖的评论类二等奖，并且对学校从此进一步严肃考试纪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将他当年撰

写的评论员文章展示于下。

考试作假要严打

本报评论员

考试，是一种检测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成果的重要手段。而长期以来，考试作假之风日益蔓延，由此而衍生出的假成绩、假文凭甚至假人才越来越多，已引起了广大师生员工和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为此，国家教委高教司日前召开了“加强高校学风建设，抓好考试管理”的专题电话会议，要求各高校认真贯彻执行，力争三两年之内使学风有根本好转。考试打假已经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我们学校也不应例外。

考试打假，要切实认清和抓好“一个目的”“两个方面”和“三个环节”。打假的目的是端正考风、改善学风。考试作假，混得虚名，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败坏学风的关键性问题。而良好的学风是学校的宝贵财富，容易给学校创建“名牌效应”。大家要抓好两个方面：一是学生，二是教师。一些学生平常不努力，考试作假，想蒙混过关，是为可耻；而一些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平常不严谨治教，考试“放水”，以保全声誉，更为可恶。教风不严，学风焉正？因此必须二者兼治。打假要抓好出卷、答卷和阅卷三个环节。考试前教师不能“勾

重点”，更不能将原题漏给学生；考试中要严格制定和执行入场和监考制度；考试后要严格阅卷纪律，不能私自给学生更改分数，更不能“受人钱财，替人消灾”。

考试打假不能“假打”，要真打、严打。一是认识要严肃。要把学生作假看作是人生观价值观上出现的问题，把教师作假当成是违背职业道德和违反《教师法》的违法行为。二是处理要严明。不管老师学生、“皇亲国戚”、贫民子弟，出了问题，同等处理。三是处罚要严厉。据悉，山西大学学生一次作假不发学位证，二次作假开除学籍，还有的大学考试作假则把统招生转为自费生，等等，不妨借鉴一试。

学习要刻苦勤奋，复习要全面认真，考试要严肃审慎，才是上策。对此善意提醒，若有人要“假装”没听到，那就更该遭打！

1996年，聂荣承担撰写建校二十周年校史的主笔并顺利完成任务。1998年上半年，聂荣得到了一个于他个人发展而言极好的机会：市招办通过教委向学校要人去办《招考报》，其时学校刚决定独立设置处级建制的学报（校报）编辑部，我极不情愿失去他这个得力助手，但想到年轻人前途事大，即使留得住人也未必留得住心，便忍痛割爱放他走了。他这一走，于是有了后来的《招考报》编辑、《课堂内外》杂志副总编辑等一系列辉煌头衔。

我比聂荣年长20岁，共事时亦师亦友，师徒二人都是一副倔脾气，碰撞与争执在所难免，但更多的是精诚团结和通力合作。闲暇时又都爱抿几口老酒，前三皇后五帝的胡侃一通，他的酒量比我好，于是总揭发我猜拳赖酒——那时候就没有什么老少之分了。

如今，我和聂荣的这份亦师亦友的情谊，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风雨的考验，这里边值得一提的事情太多太多。多年以来，他们夫妇视我和秦老师为师父师母，千金希子叫我“爷爷”，我的儿女却叫他们夫妇“聂荣叔叔”和“小宋阿姨”

(就有点像我和石天河老师一家的关系,我叫石老师夫妇老师和师母,周独奇却要叫我叔叔……)。小宋是我儿女的小学老师,我儿女高考成绩出来后,还是聂荣第一时间用电话告知的——从自重庆师专调市招办那时起,聂荣其实成了许多人的“及时雨”——帮忙看分数、帮忙择专业、帮忙调剂学校等政策许可范围之内的事情。他到底帮了多少人,真是数也数不清,这里边既可看出他的本性善良,也含有他对母校师长的一份深情厚谊。



2014年11月,聂荣率妻女返校探望并与本书编著者夫妇合影

四 “星湖”老大和他的助手

聂荣在重庆师专读书时跟了我两年半,毕业留校工作又共事近六年,在黄瓜山办校报,也算得上八年抗战。这期间除了编辑、写稿等工作,他还有一个功绩也不容抹杀,那就是和我一起培养了一系列后起之秀——一批继他之后的优秀学生记者。

当然,说是一批,却并非一大群,其具体数量是极为有限的。

1990年代末,我写了一篇题为《校报培养学生记者刍探》的论文,论文的核心内容是“少、高、博、爱、严”五字要诀。这里的“少”,是说校报编辑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办报育人上,即办好报,进行舆论导向,作广义的育人,因此,培养学生记者的数量和为其花费的精力都切切不宜过多;这里的“高”,是说校报培养的学生记者数量少但质量一定要高,即少而精;这里的“博”,是说编辑和记者其实是“杂家”,因此知道的东西是越多越好,所以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一

定要广博；这里的“爱”，是说校报培养少而精的学生记者，编辑老师尤其要给同学们一份特别的关爱；这里的“严”，即是说对那些少而精的学生记者在关爱的同时，还要时时处处给予严格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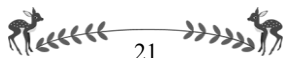
在这种纯属“一家之言”的“理论”指导下，1992年聂荣毕业留校工作后，1993级我们就只带了两个人，一个叫张采兵，他是“星湖写作社”的创始人和首任社长，但同时又是我们的学生记者。进校报到当天，他就抱着一摞稿子找到编辑部来，此后才是转系（转专业）和创办“星湖”写作社，并且没几天（具体说是1993年10月10日）已经在校报发表文章了；后来他为自己找到社长“接班人”后，还几乎是“全脱产”地跑到编辑部来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兼副刊编辑（聂荣于是得以抽身到北大去进修了一个学期）。那段时间，也是张采兵在重庆师专最辉煌的时候，因为在校内外发表了大量文章——他与杨胜亮合作的《我不洗衣我不扫地我坐三轮车》和他自己丢下刚捧着的饭碗跑到璧山去采写的《菜地长出个金疙瘩》等一系列通讯特写等，都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校报刊发了张隆高老师为他撰写的4000字的评论，还在办公楼当门橱窗为他办了个人作品展。1996年春天外出实习时，我还在学校给他申办了特许不到教学单位实习的手续，并且联系了当年的《西南经济日报》作为他的实习单位。



现任大渝网总编辑张采兵

另一个叫杨胜亮，也是中文系1993级学生，但他没有张采兵那么辉煌的成绩和体面的身份，性格也比张采兵要疲沓得多。采兵是个拼命三郎，捕捉到新闻信息伸脚就跑，饭吃到一半，便连饭钵也丢开；杨胜亮却没有这般爽性，吃饭喝汤按部就班挨着顺序来，吃喝完便掏牙缝，便找草纸说还要上个厕所。采兵等不及了，便会在屁股上给他一巴掌——“格老子，懒牛懒马屎尿多！”

所以，很多时候杨胜亮只给采兵打下手，采兵“呵斥”他，他即便很不服气也只有噘着嘴、犟着脖子跑到旁边去嘟嘟囔囔，嘟囔半天都说不出所以然，到头来还得按人家说的办。其实，杨胜亮还是挺能干的，特别是在师专学习的最后一年，他也采写了不少的稿，只是由于性格使然，他从来没有挂在嘴边炫耀过。



当然，不说不等于杨胜亮心中没数，刚毕业出去，他便寄了信回来。

一封来自西藏高原的信

编辑部的老师们：

你们好！

今天是8月14日，给你们写几句，聊一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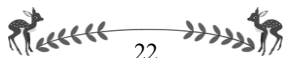
几番波折，我是7月15日离开涪陵老家开始进藏征程的，在成都待了几天，直到7月27日才到达西藏昌都。一路辛苦而新奇，多了些生活体验。我最终被分配到昌都地区师范学校。这里已经开学，不过我上新生班的课，还要闲到9月中旬新生来校。我教文选，任班主任。

昌都气候我适应，没有高原反应，现在可以又蹦又跳地玩篮球。师范校绿化好，环境和条件还可以，面临澜沧江。就目前感觉，我选择西藏并不是很错。

在信息与人文方面，这里比内地城镇是要差一点，但话说回来，不差怎轮到我们来呢，不差怎么可比内地多拿至少一倍的工资呢？依我看，我分在师范，综合评估还是可以与分回内地的中学相匹。

进报社不好，这里报社成天改通讯员来稿，难有采访机会，因为下县采访往返得几天。刚来我便闯进报社闻了一下风声。

重庆师专一行近20人，有1人留在昌都县中，2人留在地区师范，其余全



下到各县。

前几天去地区教委采访写了几篇报道。结果在地区教委各科室顺当行事，还有些熟了。教委主任打算让我兼职搞《昌都教育》，我说你叫我搞我还敢不来么。

这里月收入 800 元左右，月生活费 300 余元。看来，衣食还是足的。

这几天没事，又在试着写稿子。关于自己今后怎么过日子，怎么提高和爬行，没打算，以后再且思且行。前几天陪留校汉族女生上山采野花，也采蘑菇。

我在重庆师专生活了三年，应该说过得还可以，也有幸认识了你们几位老师，有幸得到你们的关心和帮助。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毕业了，离开了你们。离开才会想，一张师专报可观望学校风雨，此时倒对师专报有了感情。如果各方面允许，能否将师专报每期寄来品阅。

我们几个学生娃，那些时日偏离了专业搞写作，有一点进步，其中是有顾此失彼的遗憾的。正如夏老师所教导，文化底蕴不可轻薄也，写作者。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还不少。

再见了，几位老师，祝你们工作顺利，生活幸福。

西藏昌都地区师范学校杨胜亮

